

## 作者信息

### 1. 王明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6 号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

电子邮箱：mwang2021@nju.edu.cn

### 2. 刘萌萌（通讯作者）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6 号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

电子邮箱：191098127@smail.nju.edu.cn

### 3. 杨德才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6 号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安中大楼

电子邮箱：[ydc@nju.edu.cn](mailto:ydc@nju.edu.cn)

### 4. 段巍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6 号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

电子邮箱：duanwei@nju.edu.cn

# 民间信仰与国家治理：来自明清祠庙的证据

**摘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传统中国的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是历史主流。其中，民间信仰是由国家与地方社会共同构建的结果，然而该特征事实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却尚未得到充分揭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基于明清时期的祠庙与动乱数据，量化研究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民间信仰能够有效减少地方动乱，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检验。机制检验表明，民间信仰促进了公共品供给，加强了国家认同，二者都有助于社会稳定、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本文的研究探索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新视角，也能为完善当代国家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国家治理；民间信仰；地方动乱；公共品；国家认同

## 一、引言

如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世界性难题。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大一统格局，保证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离不开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当前，社会各界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国家治理自有其内生演化的逻辑，“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2014）。因此，对于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传统中国的历史现实，也能为完善当今国家的治理模式提供历史借鉴。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同时期的西欧基督教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是历史主流。而其中又以本土民间信仰最具有代表性，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参与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期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然而，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本文试图通过量化实证的方法来探究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以此弥补该领域的不足。

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虽然是自生自发产生，并具有鲜明的世俗化特征，但其演变、发展与地方社会中的角色均是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民

间信仰在可以直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之外，还具有公共平台属性，能够为其他主体的行动提供支撑，因而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基层政府职能的发挥，还是地方精英主导或参与的公共事务，往往都离不开当地民间信仰及其衍生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支持。

基于这一特征事实，本文搜集、整理了明清时期的祠庙与地方动乱数据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民间信仰能够有效降低地方社会发生动乱的概率，从而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体而言，每万人拥有的祠庙数量增加 1 单位，相应的地方动乱将显著减少 0.714 个单位，约为地方动乱标准差的 29%，均值的 36.7%。

机制分析表明，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够有效减少地方动乱、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与其由政府 and 民间社会共同塑造的特征密切相关。一方面，民间信仰与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祠庙密度越高的州府，以堤、堰、闸、坝、桥梁、渡口为代表的公共品数量就越多，从而能够有效的保障地方的生产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与国家的主流思潮形成互补关系，具有显著的政治教化作用，能够加强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祠庙分布越多的地方，在明清鼎革之际，明代“遗民”与忠臣的数量也越多。二者都是降低地方动乱、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

本文可能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采取从自下而上的视角，量化研究民间信仰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拓展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领域的研究边界。当前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主题的文献不断涌现，提出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与观点，例如，“行政发包制模型”（周黎安，2014），国家规模导致的财政能力低下（Sng, 2014），“帝国的治理逻辑”与“运动型治理”（周雪光，2017），政权的“风险论”（曹正汉，2017），以及高度集权导致的行政系统行动能力低下（Ma and Rubin, 2019）等等。然而当前的研究视角大多自上而下聚焦于官僚组织或政治权力运行等正式制度层面，缺乏对于地方社会的关注，忽视了民间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不足以对传统中国显然具有多样性、动态性以及因地制宜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变迁提出全面而有效的解释。而本文的研究则自下而上地探讨广泛分布于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对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重点关注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与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分析其作用机制。这是现有文献尚未涉及的新视角，有助于学界更为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第二，以传统中国民间信仰为主要研究对象，丰富了学界对于宗教如何影响

社会秩序问题的研究。宗教影响社会秩序一般都具有理性的经济学逻辑，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女巫审判，被处死的往往是寡居的中老年妇女，其背后原因在于气候冲击影响了经济增长，导致生存物资减少（Oster, 2004），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非洲历史上将老年妇女作为女巫杀害的现象（Miguel, 2005）。宗教信仰的类别很多，其影响也不尽相同，基于中国的经验表明，佛教能减少农民起义，而基督教则相反（黄冠佳、温思美，2017）。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儒家也可以认为是某种宗教，Kung 和 Ma（2014）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有效减缓因粮食歉收引发的农民起义。本文则是基于明清两代的数据讨论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超越了现有文献主要考虑宗教对于民众个体影响的讨论，不仅首次将民间信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机制上也探索了民间信仰对于公共品与国家认同供给的作用，这也是现有文献未曾充分发掘的地方。

第三，对于明清地方动乱的讨论，丰富了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的探讨已经非常丰富，涉及气候变化（Bai and Kung, 2011；赵红军，2012；陈强，2015）、自然灾害（陈光等，2013）、人口压力（黄冠佳等，2018）、新作物的引进（Jia, 2014；陈永伟等，2014）、政府能力（陈强，2015）、民间金融（胡金焱等，2016）、贸易中断（Cao and Chen, 2022）、国家能力（Wang, 2022），以及政权合法性（Bai, 2023）等诸多方面。此类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寻找外生冲击进行因果识别，因而研究对象也相应局限于某些特定因素。此类研究范式决定了本文所讨论的民间信仰如何维系社会秩序稳定会被忽视。但是，民间信仰在传统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如果忽视这一重要因素，那么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理解就不可能全面深刻。

本文余下章节安排如下：第二章介绍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性质，与国家及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说明其是国家与地方社会在互动中共同构建的结果，从而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第三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第四章是实证结果，汇报了基准结果，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证实了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第五章检验民间信仰在传统中国减少地方动乱的作用机制，主要讨论了在增加公共品供给与加强国家认同方面的正面作用；第六章总结全文。

## 二、历史背景

### （一）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中国本土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其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早期的神灵崇拜，经过长期的发展流变，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民间信仰文化形成于信众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之上，通过尊崇神、神话偶像以获取现实生活的启示，本质上是对客观实在的虚化与想象，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投射与心灵图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恩格斯，2009），这是通过信仰来解构和导引现实世界的基本逻辑。

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古代精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具有显著区别于佛教、道教等五大制度化宗教的特征。在杨庆堃（2016）看来，以佛教、道教等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它们具备神学或宇宙解释系统，通过系统的典籍阐释教义，建立了形式化的崇拜、祭祀体系，同时也拥有完备的人员与教化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制度性宗教可以依托其联系紧密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世俗体系之外自行运转。

而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则是一种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它们虽然缺乏系统化的文本教义和联系紧密的信徒组织，呈现出民间性、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特征。但是民间信仰也因此具有较低的信仰成本，并且凭借非一神教的开放包容性广泛根植于底层社会，借助政权与社会的力量嵌入世俗社会秩序之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种本土化信仰形态，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世俗化的特征最为突出，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信仰对象具有自身的创造性、开放性，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并与地方性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民间信仰“奉人为神”的特点鲜明，王侯将相、学者先贤，甚至普通民众都可能凭借功绩被构建为神，并被赋予响应民间需求的某种特定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包括以山川湖泊为代表的自然神，和以历史人物为代表的人格神，按照信仰对象的具体性质和祭祀目的可以进一步细分不同类别，共同组成庞大复杂的民间信仰体系，且随着社会变化不断淘汰和更新神祇，相应的祠庙修建在不断增加（如图 1 所示）。由于不同地区特定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等因素，

民间信仰也在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具象化呈现和地域化实践，例如川蜀地区的青衣神（蚕神）崇拜、福建沿海地区的妈祖（海神）崇拜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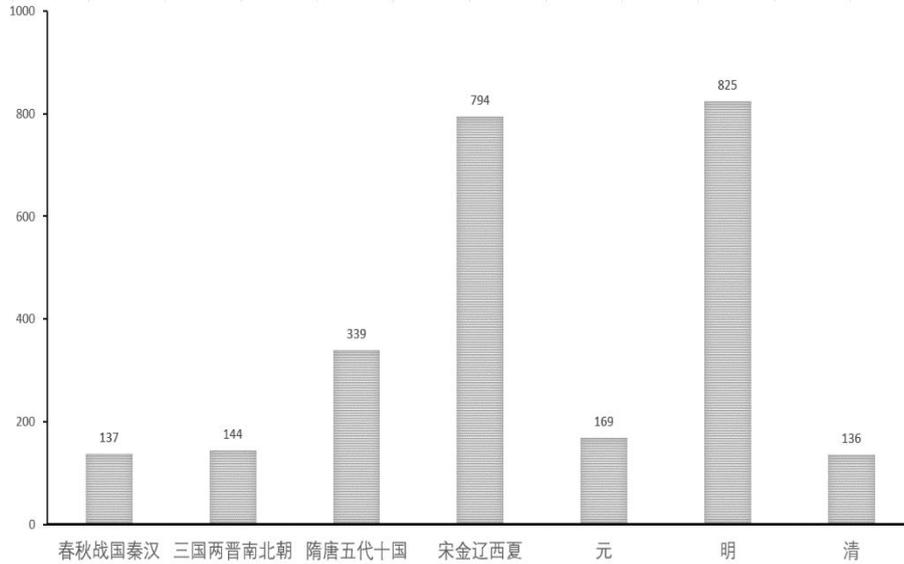


图 1. 民间信仰的发展：历代祠庙数量

其次，信仰方式生活化，信仰空间具有平台属性，并构成民间信仰的延续机制。“奉神为人”是民间信仰的又一重要特征，在敬神实践层面，力争将神灵具象化为人，使之衍生为凡世之中的“成员”。世俗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被比附于神圣空间，将圣化世界世俗化，比如为神灵修建宫殿居所、搭配夫妻关系、安排“一日三餐”贡品等，从而拉近了俗世与神圣之间的关系，促使抽象性、宗教性的神祇体系世俗化与生活化。也正因此，各类祠庙也不再是神圣的仪式道场，进而可能转换为社会治理的公共平台与世俗社会的生活空间，扮演着社区议事决策、定期庙会集市、抵御外来攻击和乡民休闲的重要场所（乔基姆，1991），这又进一步成为信仰得以延续生命力的基础。

最后，民间信仰一般通过各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组织维系其功能。民间信仰需要举行各种仪式性祭祀活动加以表达，各类民间组织应运而生，这些民间组织普遍产生和流行着各种规约、习惯、章程等形式的民间法，并能够拥有田地、会金等独立资产。在有效的产权制度的保护之下，各地区的民间信仰所对应的民间组织普遍拥有数量可观的法人财产，以及各具特色的组织与活动空间，其排他性的法人产权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从而获得了较强的动员当地资源的力量（龙登高等，2018）。因此，民间信仰与当地的世俗社会紧密的镶嵌在一起，使得了民间信仰包含世俗性与宗教性的双重特质，在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中所发挥的作

用甚至能够超过制度化宗教。

## （二）民间信仰与国家治理

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分布广泛，加之其拥有法人财产，又拥有公共平台与组织属性，具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条件。民间信仰以弥散性的方式嵌入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族群、经济社会团体和国家治理之中，承担着促进家庭和顺、稳定社区秩序、建构社会道德、推进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功能（杨庆堃，2016）。为处理民间信仰事务的各种“理事会”，基于平等身份，主动参与、充分表达意见等方式，处理共同关注议题。此类组织是代表社会基层的自我治理模式，形成了与政府组织所创设的强制性力量相对应的自治机制（费孝通，2017）。在功能上，此类民间组织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因其公共性与平台属性而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其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合作，能够有效应对公共问题。因而这种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民间组织网络构成地方基层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够减轻政府的基层治理压力，提升区域社会治理绩效。

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更多体现为国家在场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尽管政府也存在将民间信仰归为“淫祀”等异端而加以打击的现象，但是，在传统社会大多数时期，国家对地方的民间信仰秉持控制、扶植与利用的态度。传统中国辽阔的疆域内，在交通与通讯技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仅仅依赖政府的力量深入地方社会实现有效治理。因而明清时期政府在地方上施行的是“简约的集权治理”，中央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直接控制的末端一般到县为止，县以下则主要依赖准官员和地方社会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间接治理（黄宗智，2008）。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民间信仰及其相应的组织、象征性符号出现的“文化网络”不仅实现了地方居民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而且成为传统国家政权深入地方社会内部的关键渠道，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单向的，在国家试图塑造地方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同时，地方社会也通过信仰体系（如仪式行为、象征符号）接纳国家符号，进行民间信仰的再造，主动向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靠拢，以争取身份合法化。在这一过程中，民间信仰深厚的群众性、宗教性、社会性特征为传统政权合法性提供信仰支持，而政权体系通过封号赐额的形式给予民间信仰的诸神标准化、正统化确认，使之进入国家合法的信仰行列，从而形成了良性互动。

民间信仰的作用为各方所看重，士绅阶层作为传统中国的地方精英也不例外。作为平民与官员之间的特定阶层，士绅连接了政府与民间社会，是维系地方秩序的基础性力量，但其参与地方治理、公共品供给的过程，大多要通过民间组织完成（龙登高等，2022）。而民间信仰拥有广泛的信众群体与组织化程度各异的信仰网络，是提供基层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重要辅助性治理力量，受到士绅阶层重视。典型案例是华北地区龙王庙等祈求风调雨顺类型的公共性祠庙与水利灌溉类的公共品紧密联系，地方士绅为了保证本地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参与到与该信仰相联系各类事务之中。民间信仰在地方具有普遍的号召力，而祠庙又是地方社会共有的公共财产，从而构成了地方精英塑造地方权力文化网络不得不借助的重要机制（杜赞奇，1996）。

### 三、研究设计

#### （一）基准模型

为检验民间信仰对国家治理效果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conflicts_i = \alpha + \beta \times temple_i + \gamma X_i + \lambda_p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conflicts_i$ 是州府*i*国家治理效果的代理变量，以1368至1850年间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叛乱次数作为反向替代指标； $temple_i$ 是州府*i*的民间信仰发展水平，以明代之前修建的祠庙数量经明初人口标准化处理后作为替代指标； $X_i$ 是州府*i*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为增强识别的有效性，加入了省级固定效应 $\lambda_p$ ； $\varepsilon_i$ 是随机扰动项。

#### （二）数据介绍

##### 1. 地方动乱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地方动乱，具体使用明清各地农民起义和叛乱次数作为国家治理效果的反向替代指标。由于国家治理效果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其失效与否难以连续度量，而地方动乱则是国家治理失败最为激烈的体现，表现为局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和叛乱。与Jia（2014）和Bai（2023）的研究一致，本文的地方动乱数据来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使用这一数据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农民起义和叛乱中必然有一方属于地方社会，一方属于政府，符合

民间信仰涉及的两大主体。其次，相对于个人或村落之间争斗的微观数据，农民起义和叛乱的记载更为全面完整，易于获得。本文选取的地方动乱时间范围从1368年明代建立至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由于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等外部因素干扰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爆发影响，1850年之后的农民起义和叛乱未纳入被解释变量的统计中。同时除去在此期间由国家和地区矛盾引发的战争，例如沿海倭寇袭击和清军入关、抗击蒙古等。经整理一共获得356条动乱数据，其中有6条因为记载地点不明无法匹配而忽略不计。其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 2. 民间信仰

本文使用清代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所记载的祠庙数据作为各地民间信仰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祠庙是民间信仰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和祭祀崇拜等宗教仪式的活动空间，因而一个地区所拥有的祠庙多少足以衡量该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程度。经整理一共得到3463座祠庙，分布于清代内地18个省，共计248个州府，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具有明确修建时间的祠庙2544座，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至清代，并且以明、宋、唐、元以及清代修建的祠庙居多。为了避免祠庙分布和地方动乱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选择了明清之前修建的1583座祠庙作为回归使用的样本，借此消除明清地方动乱可能对祠庙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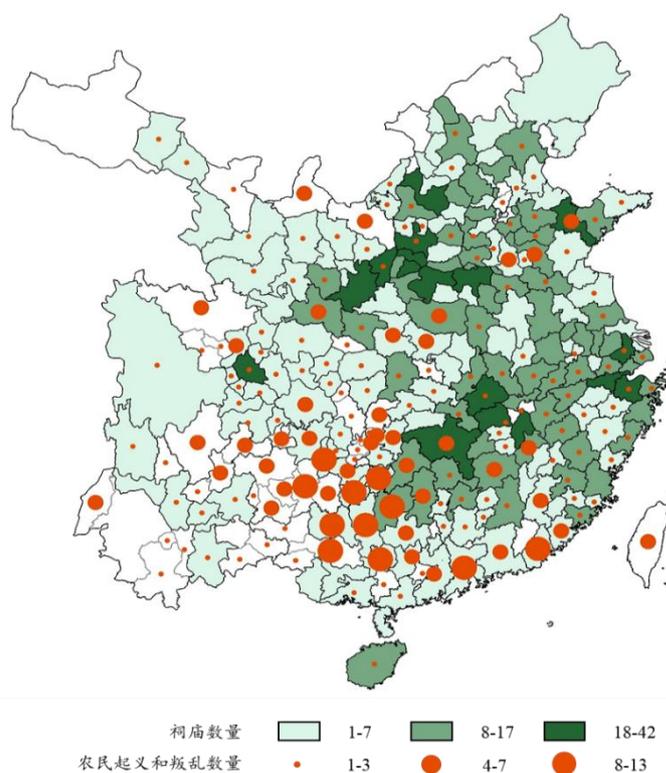


图2. 明清祠庙与农民起义和叛乱数量分布

### 3. 其他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与地方动乱和祠庙分布相关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州府人口密度，粮食作物（包括小麦，大米）适种指数和经济作物（包括茶，棉花，烟草，甘蔗）适种指数作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基础，数据分别来源于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和 Global Agro-Ecological Zones Database（全球农业生态区数据库）。参考 Ying Bai（2023）对于中国历史冲突的研究，本文另外控制了地形平均坡度、距海岸线最短长度、州府内河流长度，这些数据来自 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nflicts in 1368-1643	1368-1643 年地方动乱数量	269	1.401	2.136	0	13
conflicts in 1644-1850	1644-1850 年地方动乱数量	269	0.543	0.899	0	6
conflicts in 1368-1850	1368-1850 年地方动乱数量	269	1.944	2.463	0	13
external conflicts in 1368-1850	1368-1850 年外部冲突数量	269	0.257	1.622	0	17
hero	明代遗民忠臣数量	269	3.885	9.822	0	91
public	清代公共品(桥梁津渡与堤堰闸坝)数量	269	34.65	47.00	0	415
temple_bm	明代前祠庙数量	269	5.874	6.363	0	42
temple_bq	清代前祠庙数量	269	6.335	6.901	0	43
temple_all	清代祠庙数量	269	12.77	12.64	0	91
school_bm	明代前学校数量	269	5.732	4.997	0	27
school_bq	清代前学校数量	269	9.271	6.603	0	34
bud_bm	明代前佛寺数量	269	6.818	7.788	0	74
bud_bq	清代前佛寺数量	269	7.651	8.301	0	79
tao_bm	明代前道观数量	269	2.190	2.991	0	15
tao_bq	清代前道观数量	269	2.461	3.096	0	15
pop1393	1393 年人口 (千人)	269	268.500	331.700	1.931	1794
pop1680	1680 年人口 (千人)	269	681.200	697	2	4223
area	面积 (平方千米)	269	16146	19851	923.7	198269
slope	地形平均坡度	269	4.986	3.812	0.039	21.33
food_suitability	粮食作物适种指数	269	17.100	7.335	0.001	36.33
econcrop_suitability	经济作物适种指数	269	8.123	4.102	0.0001	25.44
coastal_distance	距海岸线最短长度	269	11.67	8.082	0	71.47
river_length	主要河流长度	269	17.10	7.335	0.0005	36.33

<code>garrison_m</code>	明代卫所数量	269	2.918	7.490	0	109
<code>capital</code>	是否为省治	269	0.071	0.257	0	1
<code>chieftain</code>	是否实施土司制度	269	0.487	0.500	0	1
<code>frontier</code>	是否位于边境	269	0.208	0.407	0	1
<code>distance_beijing</code>	距离北京长度	269	1190.409	573.213	35.732	2383.614
<code>distance_xian</code>	距离西安长度	269	839.387	354.665	38.512	1685.129
<code>distance_luoyang</code>	距离洛阳长度	269	813.546	395.145	46.802	1758.436
<code>distance_nanjing</code>	距离南京长度	269	941.643	491.283	14.685	2281.069
<code>distance_kaifeng</code>	距离开封长度	269	838.869	432.903	48.915	1894.306
<code>distance_hangzhou</code>	距离杭州长度	269	1002.061	506.561	13.592	2464.195

## 四、民间信仰与国家治理

### （一）基准回归

为更加清晰地识别民间信仰的作用，本文使用明初 1393 年各州府的人口对祠庙数量做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人口数量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基准结果汇报于表 2 的第（1）-（3）列。第（1）列只包括省级固定效应；第（2）列按照经济史文献的常规处理方式，加入人口密度作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第（3）列则考虑更多地方社会的自然特征变量，包括地形坡度、到海岸线最近距离、主要河流长度、农作物适种指数等可能影响当地社会稳定水平的变量，结果仍然维持在 5% 的显著性水平。由第（3）列可知，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地方动乱的变量后，每万人拥有的祠庙数量增加 1 单位，相应的地方动乱将减少 0.714 个单位，约为地方动乱标准差（2.463）的 29%，均值（1.944）的 36.7%。

本文将祠庙作为衡量民间信仰的替代指标，但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无法获知祠庙的具体规模，也就无法推知当地信众数量。在交通并不方便的传统中国，人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因此，以单位面积内的祠庙数量衡量当地的民间信仰发展情况，可能是个合适的选择。为此，本文使用各府的面积对祠庙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府每万平方千米的祠庙数，作为当地民间信仰发展水平的第二个替代指标。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2 的第（4）-（6）列。第（4）列只包括省级固定效应，第（5）列控制人口密度，第（6）列考虑更多地方社会的自然特征变量。结果与以人口标准化后的祠庙系数相一致，祠庙在州府面积分布上的密度对农民起义和叛乱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由第（6）列可知，在控制所有其他变量后，每万平方千米的祠庙数量增加 1 单位，农民起义叛乱将减少 0.027 个单位，约为标准差的 1.1%，均值的 1.4%。

表 2. 民间信仰对明清地方动乱的影响：基准结果

	conflicts in 1368-1850					
	(1)	(2)	(3)	(4)	(5)	(6)
temple_pop	-0.604*	-0.626*	-0.714**			
	(0.359)	(0.362)	(0.336)			
temple_area				-0.028**	-0.029**	-0.027**
				(0.012)	(0.012)	(0.013)
popden		-0.002	0.001		0.000	0.004
		(0.002)	(0.002)		(0.002)	(0.003)
Slope			0.074			0.069
			(0.054)			(0.055)
Coastal_distance			0.076***			0.074***
			(0.024)			(0.025)
River_length			-0.011			-0.017
			(0.029)			(0.030)
Econcrop_suitability			0.049			0.051
			(0.038)			(0.041)
Constant	0.740***	0.821***	-0.505			-0.467
	(0.218)	(0.234)	(1.014)			(1.022)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Y	Y
Observation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R <sup>2</sup>	0.329	0.330	0.382	0.328	0.328	0.378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国家能力强弱与社会治理水平直接相关 (Chen et al., 2017)，政府控制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地方社会的治理水平，因此地方动乱需要考虑到政府的控制力。明代黄溥撰写的《闲中今古录摘抄》中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也说明与中央政府的距离远近会影响地方叛乱数量，因此中央政府是否能对地方形成强有力的约束非常重要，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中央政府约束的强弱则主要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为了排除该因素的影响，本文借助 CHGIS 各州府治所的经纬度计算了州府与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中心——北京的距离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我们还控制了该府是否为省治的 0-1 变量，以及当地的卫所驻兵数量。分别以人口和面积标准化后的祠庙数量为解释变量，加入这 3 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显示在表 3 的第 (1) 和第 (5) 列中。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减少地方动乱的作用仍然显著。

表 3. 民间信仰对地方动乱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conflicts in 1368-1850							
	(1)	(2)	(3)	(4)	(5)	(6)	(7)	(8)
temple_pop	-0.712** (0.345)	-0.911** (0.438)	-0.858* (0.469)	-0.861* (0.469)				
temple_area					-0.025* (0.014)	-0.025* (0.014)	-0.025* (0.014)	-0.025* (0.014)
distance_beijing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Capital	0.018 (0.524)	0.040 (0.527)	0.040 (0.536)	0.037 (0.536)	0.068 (0.535)	0.062 (0.536)	0.076 (0.545)	0.076 (0.545)
garrison_m	0.030** (0.014)	0.030** (0.014)	0.030** (0.014)	0.030** (0.014)	0.030** (0.014)	0.030** (0.014)	0.030** (0.013)	0.030** (0.013)
school_bm_pop		0.350 (0.560)	0.433 (0.586)	0.433 (0.586)		-0.041 (0.472)	0.178 (0.548)	0.178 (0.548)
bud_bm_pop			-0.610*** (0.231)	-0.610*** (0.231)			-0.695*** (0.237)	-0.695*** (0.237)
tao_bm_pop			0.956 (0.861)	0.956 (0.861)			0.684 (0.820)	0.684 (0.820)
chieftain				0.361 (1.088)				0.433 (1.120)
Constant	-0.142 (1.241)	-0.200 (1.238)	-0.020 (1.231)	-0.020 (1.231)	-0.297 (1.263)	-0.287 (1.280)	-0.025 (1.273)	0.051 (1.259)
Basic controls	Y	Y	Y	Y	Y	Y	Y	Y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Y	Y	Y	Y
Observation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R <sup>2</sup>	0.390	0.391	0.398	0.398	0.385	0.385	0.395	0.395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2. 儒家文化

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传统中国地位最重要、影响也最广泛的思潮始终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对于社会动乱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学者证实(Kung and Ma, 2014)，那么基准回归结果中可能掺入了儒家价值观念对地方动乱的作用，而并非单纯民间信仰的效应。为了排除这种潜在干扰，本文使用人口标准化后的学校和书院数量（数据来自《大清一统志》），作为当地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小的替代指标。分别以人口和面积标准化后的祠庙数量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表 3 的第（2）和第（6）列中。可以发现结果仍然稳健。

## 3. 制度性宗教

研究传统中国的宗教信仰,必须考虑到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的影响。这一类型的宗教具有系统化的教义、典籍,也有相对严密的人员组织,同时也往往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它们既可能与民间信仰形成竞争或替代,也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当地的治理模式。为了排除这种潜在干扰,本文使用人口标准化后的佛寺与道观数量(数据来自《大清一统志》),作为当地制度性宗教的影响大小的替代指标。分别以人口和面积标准化后的祠庙数量为解释变量,加入佛寺和道观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表3的第(3)和第(7)列中。可以发现结果仍然稳健。

#### 4. 改土归流

从明清农民起义和叛乱的分布来看,位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似乎更容易发生动乱。考虑到明清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当地原来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治理,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由于这些地区本身就存在大量民族问题容易爆发动乱,又因为改土归流政策更加激化了少数民族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所以本文加入是否曾为土司制度实施地区的0-1变量加以控制,分别以人口和面积标准化后的祠庙数量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表3的第(4)和第(8)列,祠庙系数依然维持显著水平。

#### 5. 分时段检验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明清两代的地方动乱的累计情况,可能忽视了该时期内某些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而且会影响地方动乱的因素,因此本文将两代的数据筛选出来,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第(1)-(4)列中是1368至1643年即明代的地方动乱回归结果。由第(2)列可知,每万人拥有的祠庙数量增加1单位,相应的地方动乱将减少0.733个单位,约为明代地方动乱标准差(2.136)的34.3%,均值(1.401)的52.3%,与前文的结论一致。由第(3)-(4)列可知使用面积标准化的祠庙密度系数依然显著。

针对清代地方动乱数据,本文整理了明代新建的祠庙分别以州府人口和面积做标准化处理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汇报于表4的第(5)-(8)列。结果表明祠庙以州府人口做标准化处理在基准控制变量回归下仍然显著,加入稳健性检验中的控制变量则失去显著性水平,而祠庙以州府面积做标准化处理在二者均维持5%水平显著,明代每万平方千米的祠庙数量增加1单位,农民起义叛乱将相应减少0.016个单位,约为清代地方动乱标准差(0.899)的1.8%,均值(0.543)

的 2.9%。可见，明代民间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有效减少了清代的地方动乱。分明清两代的回归表明，无论是以人口还是面积标准化后的祠庙数量为解释变量，其结果基本上稳健，说明民间信仰的确能够显著降低当地发生地方动乱的概率。

表 4. 民间信仰对地方动乱的影响：分时段结果

	conflicts in 1368-1643				conflicts in 1644-1850			
	(1)	(2)	(3)	(4)	(5)	(6)	(7)	(8)
temple_pop	-0.633*	-0.733*						
	(0.321)	(0.422)						
temple_area			-0.033***	-0.032**				
			(0.012)	(0.013)				
templeadd_pop					-0.067***	-0.057		
					(0.021)	(0.037)		
templeadd_area							-0.014**	-0.016**
							(0.008)	(0.008)
Basic controls	Y	Y	Y	Y	Y	Y	Y	Y
Additional controls		Y		Y		Y		Y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R <sup>2</sup>	0.383	0.394	0.381	0.393	0.214	0.225	0.212	0.231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Basic controls 指基准结果中的所有控制变量，Additional controls 指稳健性检验中的中央政府控制能力变量、儒家文化变量、制度性宗教变量以及改土归流前是否为土司制度实施地区，下同。

### （三）安慰剂检验：外部冲突

根据前文的假设，民间信仰是传统中国疆域内部的一种宗教信仰，其作用对象也只可能是传统中国疆域内部的社会动乱，而无法影响传统中国和其他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外部冲突。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祠庙密度理应仅对传统中国内部的起义叛乱产生作用。如果祠庙密度捕捉了其他能够影响外部冲突的因素，则说明了此前假设的机制并不唯一，回归存在偏差。

本文收集 1368 至 1850 年间中国发生的外部冲突来进行检验，这些外部冲突包括明代与北部鞑靼部落的战争、与日本倭寇的战争等，数据同样来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回归结果见表 5。可以看到，无论以哪种方式衡量，民间信仰对于外部冲突的影响都不显著，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主要结论。

表 5. 安慰剂检验：民间信仰对外部战争的影响

External conflicts in 1368-1850
---------------------------------

	(1)	(2)	(3)	(4)
temple_pop	-0.397 (0.247)	-0.378 (0.339)		
temple_area			-0.012 (0.007)	-0.013 (0.009)
Basic controls	Y	Y	Y	Y
Additional controls		Y		Y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Observations	269	269	269	269
R <sup>2</sup>	0.391	0.406	0.388	0.405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四) 工具变量结果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在前一节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但是仍不足以确保估计结果不会受到其他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诸如度量误差、缺失变量以及反向因果关系等。尤其是反向因果问题，民间信仰可能是当地动乱频发的结果。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加以解决。

一个好的工具变量要求其随机干扰项无关，而与内生变量相关。在本研究中民间信仰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越是长期有效互动的地方，此类能够发挥治理作用的民间信仰发展程度越高，相应祠庙数量也就越多。因此，我们选择各州府和历史上各都城之间的距离，即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杭州的距离，并取对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以检验内生性问题。如图 3 所示，各地的祠庙分布数与距离历代首都的距离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据此，设定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方程如下：

$$conflicts_i = \alpha + \beta \times \overline{temple}_i + \gamma X_i + \lambda_p + \varepsilon_i \quad (2)$$

$$\overline{temple}_i = \alpha_0 + \alpha_1 lndis_i + \gamma X_i + \lambda_p + \varepsilon_i \quad (3)$$

其中，方程（3）为第一阶段回归，被解释变量为内生变量，即各地的祠庙分布数量，工具变量为各地到历史上的都城的距离的对数值  $lndis_i$ 。方程（2）为第二阶段回归，此处的被解释变量与方程（1）相同，即各州府动乱数量，而  $\overline{temple}_i$  为第一阶段得到的  $temple_i$  估计值。除此之外，（2）、（3）式中的其他变量均与方程（1）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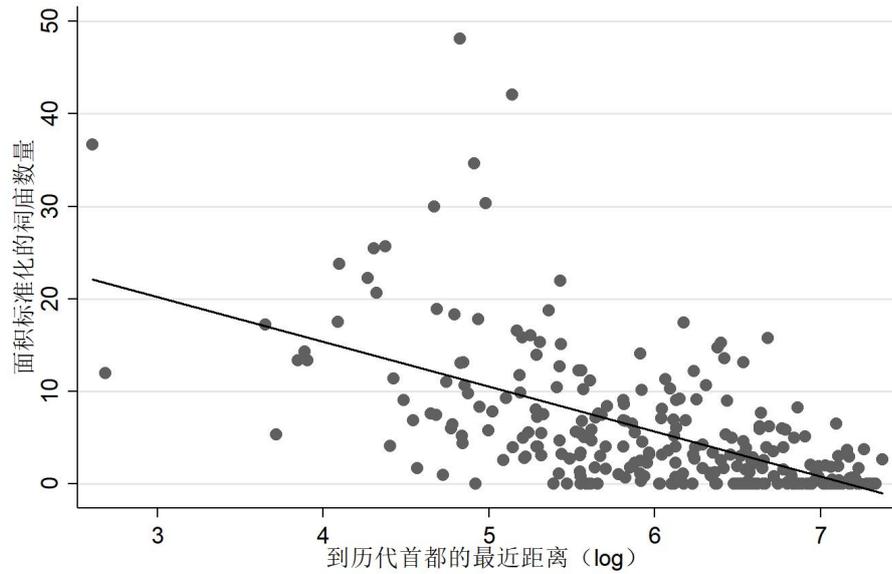


图 3. 民间信仰与到历代首都距离

结果汇报在表 6。其中，第 (1) 列为 reduced-form 的结果，第 (2)、(4) 列为不同控制变量条件下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距离历代首都越远的地区，民间信仰越薄弱，且一阶段 F 值大于 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担忧。第 (2) - (5) 列为相应的 IV 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 reduced-form 的结果，还是 2SLS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仍然一致。

表 6. 民间信仰对明清地方动乱的影响：工具变量结果

	conflicts in 1368-1850	temple_area	conflicts in 1368-1850	temple_area	conflicts in 1368-1850
	Reduced form (1)	IV First stage (2)	IV Second stage (3)	IV First stage (4)	IV Second stage (5)
temple_area			-0.068 (0.045)		-0.123** (0.057)
Indis	0.569** (0.225)	-4.802*** (1.282)		-4.614*** (1.150)	
Basic controls	Y	Y	Y	Y	Y
Additional controls	Y			Y	Y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Y
K-P Wald rk F statistic		14.02		16.11	
C-D Wald F statistic		41.05		35.81	
Observations	269		269		269
R <sup>2</sup>	0.400		0.371		0.359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五、机制检验

## （一）民间信仰与公共品供给

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国家治理水平、国内的治安状况等一系列因素均与公共品供给问题密切相关（Pottebaum and Kanbur, 2004）。一个自然的逻辑是拥有更多公共品供给的地区，更能抵抗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从而降低国家治理过程中爆发动乱的可能性。由第二章的分析可知，民间信仰作为民间组织协商议事的平台，能够促进当地自发进行公共品供给。由《大清一统志》记载的堤堰闸坝和桥梁津渡也可见二者关联，部分公共品即以相关祠庙命名，例如安陆府（今湖北钟祥）的草庙堤、红庙堤和老鹤庙堤；天津府的晏公庙渡和真武庙渡。

虽然传统中国公共品大多由民间自发供给，但是政府作为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也不容忽视，主动提供公共品、积极施政治理的官员会受到民众推崇，在去世之后拥有自己的祠庙，进而成为民间信仰的祭祀对象。由于后者更多展现政府的有为，所以在官修地理总志中也多次出现，以淮安府为例，当地有三座专门祭祀“河臣”的祠庙——陈恭襄祠、潘公祠和三河臣合祠，这些官员均在淮安府修筑有堤堰闸坝，因而被立祠祭祀，他们曾经提供的堤堰闸坝如下：

高家堰：明永乐间平江伯陈瑄筑高家堰，自新庄镇至越城计一万八千一十八丈，横亘西南淮水无东侵之患……

通济闸：永乐中陈瑄筑名新庄闸，嘉靖中闸废改置通济闸於三里沟，隆庆六年河臣潘季驯迁於甘罗城南後因之，本朝乾隆二年重建二十七年重修。

高堰堤：南河全考万历六年总河潘季驯筑高堰堤，长六十里，内砌大涧口等处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

本文使用量化手段检验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对当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同样使用来源于《大清一统志》记载的堤堰闸坝和桥梁渡口数据作为公共品的代理变量。由于大部分公共品的修筑时间不明，本文使用了记载的全部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7。第（1）-（3）列将公共品数量以人口数量标准化后作为被解释变量，第（4）-（6）列是公共品数量的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可以看到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公共品密度和民间信仰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祠庙分布越多的地方，公共品供给也相应越多，进而提升了当地治理水平，减少动乱的可能。

表 7. 民间信仰与公共品供给

public_pop	public
------------	--------

	(1)	(2)	(3)	(4)	(5)	(6)
temple_pop	3.324** (1.513)	3.739*** (1.348)	2.681* (1.546)	18.236* (9.755)		
temple_area					2.414** (1.106)	1.847** (0.914)
Basic controls		Y	Y	Y	Y	Y
Additional controls			Y	Y		Y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R <sup>2</sup>	0.121	0.135	0.178	0.328	0.271	0.355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二）民间信仰与国家认同

宗教信仰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构建地方的、区域的乃至整个帝国的身份认同（田海，2022）。民间信仰由传统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构建，二者互动的结果是民间信仰加强了官民之间的联系，凝聚起双方的共识。对于政府和民间社会而言，国泰民安、海晏河清是共同期盼。基于此，曾经开创太平盛世的先代帝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忠臣武将受到了政府和民间社会共同的尊崇和祭祀。《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了大量属于此类的祠庙，例如，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祠庙，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颜真卿祠庙，在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十省均有其祠庙；同样南宋文天祥、岳飞二人的祠庙也广为分布。这些祠庙强调国家统一稳定和官民忠诚勇敢，有效地发挥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教化作用，提升了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尽管这一思路已有文献已经进行讨论，然而尚未见有量化证据。本文利用明清鼎革的特殊时机，搜集整理了明末忠臣的分布数据，以检验民间信仰是否提升了国家认同。这一数据来源于《明遗民录》和《皇明四朝成仁录》，将两个名录中记载的各州府的明代遗民与忠臣数量标准化后，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回归，结果见表 8。可以看到，祠庙分布越多的州府，明代忠臣的数量也越多，且各种控制变量加入后也未影响基本结果。这意味着民间信仰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的确拥有更高的国家认同，从而在明清鼎革之际拥有更多的忠臣，他们的政治忠诚一方面直接减少地方动乱，另一方面也间接通过官员的有效治理降低地方发生动乱的可能性。

表 8. 民间信仰与国家认同

	hero_pop				
	(1)	(2)	(3)	(4)	(5)
temple_pop	0.144*** (0.051)	0.133*** (0.050)	0.136*** (0.051)	0.124*** (0.046)	0.136*** (0.050)
popden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lope		-0.008 (0.005)	-0.008 (0.005)	-0.008* (0.005)	-0.011** (0.005)
coastal_distance		0.004** (0.002)	0.004*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river_length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0.002)	0.000 (0.002)
econcrop_suitability			-0.002 (0.005)	-0.002 (0.004)	-0.003 (0.005)
capital				0.176*** (0.055)	0.180*** (0.057)
distance_beijing				-0.000 (0.000)	-0.000 (0.000)
garrison_m				0.004** (0.002)	0.004** (0.002)
school_bq_pop					0.012 (0.015)
bud_bq_pop					0.011 (0.063)
tao_bq_pop					-0.061 (0.106)
chieftain					0.116 (0.135)
Constant	0.038 (0.048)	-0.011 (0.082)	-0.004 (0.082)	0.068 (0.109)	0.074 (0.106)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Y	Y	Y	Y	Y
Observations	269	269	269	269	269
R-squared	0.085	0.118	0.118	0.181	0.191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六、结论

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中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大量文献验证了宗教因素在个人决策、社会秩序、公共品供给等领域中潜移默化的作用。本文从民间信仰由国家与地方社会共同塑造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信仰对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民间信仰作为传统中国地方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减少地方动乱、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结论表明拥有更多祠庙分布的州府，其地方动乱数量更少，表明其治理水平相应更高。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有效提高了地方公共品供给，并且塑造了国家认同，增强政治忠诚。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近年来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不仅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也大大拓展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本文以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出发，探索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丰富性，为以上政策措施提供了一定历史依据，同时也讲述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展现了深厚而包容的中华文明。

## 参考文献

- 曹树基, 2000:《中国人口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曹正汉, 2017:《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第3期。
- 陈光、朱诚, 2003:《自然灾害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与中国自然灾害的关系》,《灾害学》第4期。
- 陈强, 2015:《气候冲击、政府能力与中国北方农民起义(公元25-1911年)》,《经济学(季刊)》第4期。
- 陈永伟、黄英伟、周羿, 2014:《“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对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的一项历史考察》,《经济学(季刊)》第3期。
- 戴康生、彭耀, 2000:《宗教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道格拉斯·C 诺思, 2008:《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 杜赞奇, 199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方修琦、苏筠、尹君、滕静超, 2015:《冷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第6期。
- 费孝通, 2017:《江村经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韩森, 2016:《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 中西书局。
- 胡金焱、张博、范辰辰, 2016:《气候冲击、民间金融与农民起义——典当的避险作用》,《金融研究》第8期。
- 黄冠佳、温思美, 2017:《君主素质、宗教约束与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黄宗智, 2008:《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第2期。
- 克里斯蒂安·乔基姆, 1991:《中国的宗教精神》, 中国华侨出版社。
- 雷闻, 2009:《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上海三联书店。
- 龙登高, 王正华, 伊巍, 2018:《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
- 龙登高、王明、陈月圆, 2022:《传统士绅与基层公共品供给机制》,《经济学报》第2期。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人民出版社。
- 皮庆生, 2020:《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水越知, 2002:《宋代社会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の出現》,《東洋史研究》第4期。
- 田海, 2002:《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 新星出版社。
- 习近平, 201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14-02/17/content\\_2612860.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02/17/content_2612860.htm)。
- 杨俊峰, 2019:《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杨庆堃, 2016: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赵红军, 2012: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2期。
- 郑士有、王贤淼, 1994: 《中国城隍信仰》, 上海三联书店。
-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1995: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 周黎安, 2014: 《行政发包制》, 《社会》第6期。
- 周雪光, 2017: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一个组织学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 Bai Ying, 2023, “Shaking Legitimacy: The Impact of Earthquakes on Conflict in Historical China”, *The Economic Journal*, 133(652), 1286-1317.
- Bai Ying, James Kai-sing Kung, 2011, “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3), 970-981.
- Cao Yiming, Chen Shuo, 2022, “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5), 1555-1590.
- Chen Zhiwu, Ma Chicheng, and Andrew J. Sinclair, 2022, “Banking on the Confucian Clan: Why China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So Late.”, *The Economic Journal*, 132(644), 1378-1413.
- Chen, Zhiwu, Kaixiang Peng, and Lijun Zhu. 2017, “Social-Econom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Homicide History of Qing Chin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3: 8-25.
-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2016, “CHGIS Version 6 Datavers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chgis\\_v6](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chgis_v6).
- James Kai-sing Kung, Ma Chicheng,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1, 132-149.
- Jia Ruixue, 2014. “Weather Shocks, Sweet Potatoes and Peasant Revolts in Historical China”, *The Economic Journal*, 124(575), 92-118.
- Ma, Debin, Jared Rubin, 2019, “The Paradox of Power: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n Imperial China (and other absolutist regim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2), 277-294.
- Miguel, Edward, 2005, “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2(4), 1153-1172.
- Oster, Emily, 2004,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 215-228.
- Pottebaum, David, and Ravi Kanbur. “Civil war, public goods and the social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2.4 (2004): 459-484.
- Tuan-Hwee Sng, 2014, “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00–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4, 107-127.
- Wang Yuhua, 2022,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lk Belief and St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he Templ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remarkably inclusive,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diverse religious beliefs is the mainstream of history.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is prominent feature on state governance and its mechanism have not been fully reveale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folk beliefs in traditional China are jointly constructed by the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olk beliefs on state governance. Research shows that folk belief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local unrest, and this conclusion passe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st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folk belief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ocal public goods supply level, but als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local society's national identity, both contribute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explores a new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governance model, and also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contemporary state governance.

**Key Word:** State governance; Folk belief; Local unrest; Public good; National identity